T089 — 清末民初的失败能否证明中国人永远不能民主？

Free China Movement

Version: as published 2026-11-22

© 2026 Free China Move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Canonical edition: https://freechina.live/china-news-updates/democracy-civil-society/zh-hans-myths-t089-late-qing-early-republic-failure/

This document was generated from the final published text. The PDF is the authoritative download copy; the online edition above is the version of record.

这一主张，公平地陈述

这一论证是这样的。中国曾经尝试过一次民主，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而它失败了。1911 年革命推翻了帝国；一个拥有议会、政党和总统的共和国宣告成立；几年之内，这一实验就崩溃为独裁、分裂和军阀统治。如果一个民族得到了民主却保不住它，这一失败必定揭示了关于这个民族的某种永久性的东西——他们的文化、习惯、政治性格。因此，论证得出结论，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进一步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这一主张的官方版本见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中国的民主》（2021 年）。白皮书第一部分记载，辛亥革命后，“中国模仿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白皮书把这一失败视为另一段故事的起点：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但宿命论的解读走得更远，把一次历史失败变成对一个民族的永久裁决。本文审视的正是这一步。

宿命论的论证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所指的失败是真实的。早期民国确实崩溃了。问题在于这一崩溃证明了什么。一次失败的尝试证明那次尝试中出了问题；它本身并不能证明成功永远不可能。要判断这一失败意味着什么，必须把原因分开。通常纠缠在一起的解释有五种——战争、财政、组织、外部力量和文化——而它们分量不同。只有最后一种——文化——能够支持“永远”这一说法。前四种是环境，而环境是会变的。

战争：一个生于武装冲突的共和国

中华民国于 1912 年宣告成立，成立之时这个国家刚刚打完一场革命，而且即将打更多的仗。民国第一位实际强人袁世凯着手集中权力，在 1915–16 年试图恢复君主制，于 1916

年去世；他死后，中央权威瓦解，国家进入军阀时代，地方军事指挥官控制各省、彼此交战。1926–28 年的北伐最终在南京重建了中央政府，但那是在十多年之后，在这十多年中，没有任何文官机构拥有稳固的武力垄断。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最低条件：输掉选举、议会投票或内阁争论的人必须接受结果，而不是伸手去拿枪。在军队听命于地方指挥官而不是文官政府的地方，议会可以尽情辩论；它的决定只在将军们允许的地方得到执行。早期民国的议会不是在辩论中被击败的。它们是被手握兵权的人解散、恐吓或无视的。这是武力垄断的失败，而不是中国人投票能力的失败。任何社会——欧洲的、美国的或亚洲的——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会看到自己的议会失败。这次试验不是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在不可能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对受试者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财政：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

第二个、更为安静的原因是金钱。一个民主国家需要它所控制的收入，通过政府自己运作的机构征收，足以支付官员、士兵和法官的薪水，而不必依赖债权人或外国列强的善意。早期民国从未拥有这一点。它的中央政府长期资金短缺，依赖外国贷款，无法在由军人控制的各省可靠地征税。海关是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在外国监督下管理，其收入被抵押用于偿还外债。一个连自己的军队都发不出薪水的政府无法指挥它；一个连自己的决定都无法出资的议会无法治理。

重点不在于中国贫穷——贫穷本身从来没有阻止过民主政府——而在于国家的财政机器不在国家自己手中。一个没有国库的议会是一个辩论社。同样，这是一个可以补救的制度缺陷，而不是文化特质。每一种现代国家，包括后来几十年里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都先建立了财政能力，随后看到了稳定的民主竞争；顺序很重要，而早期民国从未有机会按这一顺序走下去。

组织：没有根基的政党

第三个原因是组织上的。早期民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城市里一小圈受过教育的人，而不是拥有分支、成员和地方根基的群众组织。选举举行了，但选民范围狭窄，政党在通商口岸和省会之外几乎没有存在感，政治忠诚往往追随个人关系网络而不是政纲。当袁世凯向议会动手时，没有任何全国性组织能够同时在街头、报刊和各省捍卫议会。国民党后来建立了这样的组织——并在 1928 年之后用它以一党制国家的方式进行统治，而不是恢复竞争。

这同样是关于某一特定时刻的偶然事实。政治组织是一种技能和一种基础设施，是可以建立的。1919 年的五四运动表明，新的组织形式——学生社团、刊物、工会、商会——已

经在出现。它们在 1913 年或 1916 年还不够强大，说明的是它们有多么年轻，而不是中国人能否组织。一代人之后，同一个社会产生了各种群众政党、工会和公民社团。

外部力量：一个承受外国压力的共和国

第四个原因是宿命论故事中最常被略去的一个：外国力量。早期民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运作，存在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和外国对关键收入的控制。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扩大对中国的控制；1919 年，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引发了五四抗议。外国列强武装相互对立的军阀，向服务于其利益的派系贷款，并在其特权受到威胁时随时进行干预。

在外国政府武装其对手、向其国库发号施令的时候，没有哪个脆弱的新生民主国家能够治理得好。外部压力没有造成共和国的弱点，但它利用并加深了每一个弱点。在无视压在天平上的手的情况下评判这一实验，不是历史，而是一场被操纵的审判。而且，这一条件是暂时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被废除，外国租界也归还了。无论早期民国的失败是什么，都是在国家主权被占领之下的失败，而不是在主权自由行使之下的失败。

文化：那个必须承担举证责任的解释

剩下的就是文化解释——中国文化、儒家等级制度或所谓对秩序甚于自由的偏好使民主成为不可能的主张。这是唯一能够支持“永远”一词的解释，而它是五种解释中最弱的一种。

第一，它根本不是对这些事件的解释。1912–1928 年的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一个文化原因。战争、破产、组织涣散的政党和外国干预，每一个都已足够，合在一起更是压倒性的，而且它们都有文献记载，无需诉诸民族性格。一个对物质原因已经解释的东西毫无补充的文化解释是多余的。

第二，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宿命论者援引的同一儒家传统，包含着向统治者进谏、对人民福祉作为政府衡量标准的强烈传统，以及反抗暴政的传统。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1898 年的改革者、1911 年的革命者、五四一代——汲取中国思想与外国思想，要求立宪政府。一种既产生对民主的要求、又产生追求民主的制度的文化，不能被描述为本质上敌视民主。

第三，也是决定性的，这一预测自那以后已经受到了检验——而它失败了。中华民国（台湾）1987 年解除戒严，1996 年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此后多次实现执政党的和平轮替。台湾人民在语言、家庭结构和文化传承上是中国人；他们的民主实践是真实的、竞争性的、持久的。在更广泛的地区也是如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议会民主，韩国在 1987 年运动之后实现了民主化。如果文化就是命运，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宿命论的论证预测中国人不能维持民主；过去四十年的证据表明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

这一失败真正证明了什么

清末民初的失败证明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比宿命论者所说的要窄。它证明，输入民主的外在形式——议会、政党、总统——是不够的。制度需要一个能够执行其决定的国家、它所控制的国库、植根于社会的组织，以及不受外国支配的主权。早期民国在这些方面没有一个达到足够的程度，它的议会在其所缺乏的东西的重压下崩溃了。

这是一个关于国家建设的教训，而不是关于民族性格的教训。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白皮书以自己的方式得出的教训：白皮书前言坚持认为，民主必须按人民是否真正当家作主来评判——“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而且没有哪一种模式适合所有国家。宿命论者误读了历史，把一种模式在最恶劣条件下的失败当作关于一个民族的证明。仔细阅读历史，证明的恰恰相反：击败早期民国的那些条件是可以补救的，它们在重要方面已经得到了补救，而在它们得到补救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在中华民国（台湾）——中国人已经建立并维持了民主政府。

清末民初并没有证明中国人永远不能民主。它们证明，民主不能建立在战场上、空空的国库上和外国的枪口下——而当这些条件改变时，裁决也随之改变。

资料来源

- **主要来源（2026-11-19 在线核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2021-12-04。https://bb.china-embassy.gov.cn/chn/xwdt/202112/t20211207_10463217.htm — 第一部分引文（“辛亥革命后，中国模仿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已对照所抓取原文逐字核实；前言关于按真正参与评判民主的段落（“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也已逐字核实。本文所有其他历史陈述均为一般性的、确立的事实（1911 年革命；1912 年民国宣告成立；袁世凯 1915–16 年复辟帝制尝试及 1916 年去世；军阀时代；1926–28 年北伐；1919 年五四运动；1915 年二十一条；1919 年凡尔赛山东决定；中华民国（台湾）1987 年解除戒严及 1996 年首次总统直选；日本战后议会民主；韩国 1987 年民主化）。除此之外，未断言任何统计数字、日期或引文。
- **CCE123 回链：** 未收录。终稿 46（清单草稿 CCE-042）：在英文中心页或通过搜索均无法核实其在线网址，且 CCE-042 的 YD 裁决已有记录，被已发表的 GPT1 原稿取代——省略。终稿 47（清单草稿 CCE-043）：无法核实其在线网址——省略。终稿 48（清单草稿 CCE-044）：已在线核实，网址 https://freechina.live/china-news-updates/democracy-civil-society/en-cce-044-demographic-structure-aging/ ——但该文涉及人口转型与老龄化，与本主题不重叠，因此不强行添加链接。英文中心页本身（https://freechina.live/china-news-updates/democracy-civil-society/）在

2026-11-19 无法抓取（上游“未找到”）；终稿 46／47 的在线状态因此仍未核实，而非确认为不存在。

另有版本：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